

目 录

导言 全球化理论的问题

总的问题

“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理论

第一章 肖尔特的谬误

导言

定义的成就

何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第二章 罗布·沃科尔 哲学的背景？

导言

本体论假设

空间与现代性

为什么是空间？

国际理论的质疑

第三章 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 社会学的基础？

导言

形成断裂

前进还是后退？

队列中的困惑

论证的重组

时间和空间在捉迷藏

结论 全球化理论 庙宇的坍塌

导言 全球化理论的问题

1994年,安东尼·吉登斯写道:“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的辞典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术语。”^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于 1985年发表关于这个课题的演讲^②之时,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因为在此期间的十年中,这一术语取得的进展已经相当可观。在学术著作和政府政策声明中,在新闻媒介和公众意识中,均宣称这个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联合在一起了,该观点似乎已确立了牢固的影响力。《国际先锋论坛》更是无与伦比,它在一个 1991年的早晨^③着实让读者震惊了一下,因为该期的一条标题是:“全球化跃变为现实”。而在许多学术著作中学者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赋予这个概念的学术含义,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全球化不仅被认为标志着一种真实的、基本的社会转型——“以全球性传播现代性”^④,而且,作为这种转型的结果,一些正统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也变成多余的了,这甚至波及到“社会”这一概念本身。更为戏剧性的是,全球化使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化”^⑤成为必需,这种空间化是建立在对社会秩序结构中的交通速度之中心地位的“回溯性发现”^⑥上的:

大洲和作为整体的全球的划分,是距离起的显著的作用,而距离的产生又归因于交通的原始性和旅途的艰难,这一点突然变得很清楚……“距离”是一个社

会的产物,它的长度根据能够克服距离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所有其他用以构建、分离和维持集体认同的社会的产物——诸如国家边界和文化障碍——回过头来看,似乎仅仅是速度的副产品。^⑦

简单地 说,对于一些作家——以下称之为“全球化理论家”^⑧——而言,全球化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论题”,并成为“我们借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转换的关键概念”^⑨。

总的问题

在任何严肃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结果。因为恰恰是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的“全球化”自身充满了麻烦。毕竟,乍一看来,“全球化”这一术语仅仅是一个描述性范畴,既表示社会进程的地理扩张,又有可能表示吉登斯所定义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⑩。现在,既然没有人否定“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今天确实以种种方式存在着,而且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理应没有人反对倡导一种全球化理论,如果这种理论意味着是对上述进程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的解释。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如果要避免空洞的循环,就必须求助于一些更为基本的社会理论,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术语所表示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如此独特、如此显著的特色。(全球化不能被仅仅解释为引起朝向全球化这种结果发展的过程。)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举例来说,如果“时空压缩”被解释为一种特殊历史类型的社会关系的自发属性,那么“全球化”这一术语将根本不是它所表示的那个理论——它将仅仅作为这种历史进程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程度的尺度。很清楚,全球化的理论家们还打算做得更多。他们宣称,作为社会活动场所

的单一全球空间的出现,日渐压倒了其他任何偶然性的结果,这种偶然性传统上曾被用于解释社会现象。他们推断,这一现象的地理维度已经转换为一种替代理论,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维度问题。最后,他们不仅使这一问题与当代社会科学进行竞争,而且使之与全部现代社会思潮的古典基础进行竞争。通过所有这些方式,他们已经使自己的眼界超越了这一概念所承担的单纯描述性角色。在他们论点的逻辑结构中,原本作为被解释项的全球化,作为某种历史进程发展的结果,已经逐渐转换为解释项了。恰恰是全球化现在正在解释现代世界的变化,甚至还产生了对过去时代的“回溯性发现”,本来这些问题是假定不存在的。

这种被解释项与解释项的倒置不能在纯逻辑的基础上被轻易地加以否决。毕竟,一种特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自身确实可以逐渐变成为重要的原因,反过来又制造出原初历史进程所不能产生的结果。这对于历史发展的本质而言是固有的。比如说,马克思就相信,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已经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础,而无论这些关系原初是否是其他原因(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的)造成的。事实上,马克思也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是系统陈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一新问题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他也断言对于过去(前资本主义时代)作回溯性发现的可能性。^①这一对照表明,全球化理论不能简单地根据推断加以否定。但是,这也提醒我们注意这种理论的真实特征。正如安克·胡格维尔特在一部表述温和但准确地把握了这种观念转换的书中指出的:

这里争论的是,由于世界正被重新组合成一个单一的社会空间,完全同一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全球化)现在已经跃变为一个新的可变通范围。如果说,在以前,在人类状况逐渐统一和渗透的意义上的全球整合,

那些社会的社会权力的组织和文化意义的建构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社会学意义上的和哲学意义上的）¹⁵。

然而，当人们阅读这些文献时，很快便会意识到——而且这肯定是关键点——在那些更为严肃的作品中，没有人会在字面上理解“虚化”（~~漢易~~）。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确认，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上把空间和时间当做没有内容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进程定位并形成于其中。这种进程能够通过时空来分析——考虑到距离、接近、持续、同时、顺序等的“客观性”的基础，来阐明它们如何调动所有的可能性。而且，把空间、时间当做是虚化的、同质的、统一的、抽象的，是建构这种形式的分析的前提条件。这些作家也都认识到，西方调动空间和时间的现代特殊性，的确是根植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它独一无二地推断：这种“虚化”、“科学性”是它自身文化和社会对空间和时间建构的中心形式，而且这反过来又是构成现代社会再生产的许多重要维度——诸如官僚机构、意识的历史形式、民族国家的界限，等等——的条件。¹⁶

但也不过仅此而已。因为首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其他时段和文化时，就不能弄清楚，鲁尔、提夫、阿尔及利亚、马雅、古希腊、巴厘等地方的人们生活在与现代欧洲如此不同的时空世界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本应该出现的他们自身的现代性。虚化空间和时间的观点与前社会自然特性的明显对应，不能改变这些观点充满着社会和文化决定论的事实。这种状况只会使上述决定论易于出错，因而非常可能使这些决定论自然化。

避免这一结果的惟一方式是基于分析来加入如下问题：在哪一种社会（或文化）中，时空维度采取“可虚化”时空这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其原因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它间接地控制着分析的逻辑结构，比如，罗伯特·大

卫·萨克在《人类的领土性：理论和历史》中对空间的论述，或唐纳德·洛在《资产阶级感觉的历史》中对时间的分析，以及尼柯斯·普兰查斯对他称之为“时间和空间的内在概念模式”^①的分析，就是如此。而且，这种分析远不是将接下去的关于时空在社会现实结构中的重要性问题缩小化，却恰恰是将它们适当地组织起来以在社会学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因此，即使是（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在研究空间和时间的领域中——这一领域中的时空现象非常突出——颠倒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正常关系的动向也遭到普遍的抵制。相反，颇具特点的先行动向是，借助于以虚化形式制造和再制造时空的特殊社会和文化关系，来对现代时间和空间的虚化进行社会学和现象学上的解构。通过这种方式，时空问题本身的出现就被排除了，而且人们可以轻易地明白这是为什么。无论牛顿或后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家可能会告诉过我们有关自然界的什么，却没有经历过不是以特殊的社会—文化形式斡旋和建构的时空决定因素。因此，试图去构造一种普遍的时空研究的术语，就必然会碰到比较分析的问题——这使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不同地产生了距离、接近、持续、同时、顺序等共同参数。然而，如果这些范畴被完全融合到社会解释的逻辑结构中去，它们就必然导致争论，如同萨克以外交辞令指出的：“将空间的重要性过分普遍化”^②。而且在这种过分的普遍化中还内在地存在着进一步的危险：虚化空间和时间（它们实际上来源于这些现代形式的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的特性，将会很不明智地赋予空间和时间本身“客观”的特征，并因此使一些现象自然化和不可破译，其效果恰恰是促进了空间和时间在第一位置上的高度膨胀。简言之，它们将被人为化。在这个基本的理论错误上，我们指出，我们将在全球化理论中发现最终的根源和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里根对她日益昏聩的父亲说：

你的本性站在了它的范围的边缘：

你将被某些辨别力左右和引导，

它们比你自已更好地判别你的国家。^⑩

当代社会科学在它们热望解决时空问题时，似乎也是站在了它们的连贯性的边缘。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将试图表明，它们超越了这个边缘。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对三个跨越边缘的例子加以分析，以作品的先后为序，分别是让·阿尔特·肖尔特、罗布·沃科尔和安东尼·吉登斯。第一位作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倡导全球化理论，第二位作家贯通国际关系领域和哲学领域，最后一位占据了“直接的”社会学领域，而且肯定是全球化的社会学领域中最著名的倡导者。通过对比这三个例子——每一个都来自于不同的智力方向（而且每一个文本都显然不能够和其他文本相互参照）——我们能够得出隐含在全球化理论雄心中的谬误。

但是，本书的目的并不都是否定性的。全球化理论因其全部的知识上的巨大努力，还是有其优点的：它使两点可以值得讨论和辩护。第一点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地位——它首先在卡尔·马克思的书中体现出来，其后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体现出来，也在持续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既然这种发展的本身仅在其与演进中的历史事实的关系中才有意义，那么这些观念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从而能否使它们与当代社会保持联系的问题，就完全站得住脚了。而且，正是这种质疑迫使 悦·赖特·米尔斯称之为“传统的古典社会分析”^⑪的拥护者们更新和扩展了传统，他们试图证明古典社会学的方法和眼界可以阐释看起来超过它们的分析范围的历史事实。在这本书中，肯定的目标必须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即批判其他作家。不过仍然很有希望的是，在这种批判中，本书

正在捍卫的价值也变得更清楚了。然而,如果书中对这些作家作出有力的评判的话,那么该书其实是不应该被当做一部试图证明这些作品不合理的书来读的。事实的真相是,笔者正是由于上述作家的激励才得出他自己更为细致的结论的。所以,最强烈的反对也必须最终服从于把我们统一在一起的东西:集体努力以理解社会世界的共同追求。

在全球化理论的争论中被抛出的第二个争议问题是:现代性的社会世界,把“国际”的观念当做重要和特殊的维度。有时,全球化理论相当极端地对之加以否定,这迫使我们估量这一观念,并澄清什么应该加以保留,或者是否应该全盘保留,什么正处在危险之中。

“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理论

如果“大洲和作为整体的全球的划分”的确在被打破的话,并且如果全球化理论的含义合理的话,那么不仅作为一个地域实体的“社会”的概念将必须让位于正在发生的现实,而且传统上被定义为跨实体、实体间和实体中的相互行动的研究也将被迫进行最基本的修改。因此,让·阿尔特·肖尔特指出,“方法论上的领土主义”已被写进了“国家间”关系的定义中去了。他提出,这使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人都被当代全球挑战中的“超地域”特征所蒙蔽。因为这种状况不仅日益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地域空间中,也日益存在于由现代金融市场、卫星通讯和计算机网络促成的“无距离空间”中。现在迫切需要进行知识上的纠正了:“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对方法论上的领土主义做出让步,其危险性是存在的。”^②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的纠正尚未进行,或者至少不像全球化理论家在其他领域中进行得那么快。根据马尔科姆·沃

特斯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理论已证明不能超越“全球化的原理论”^②。在这种理论中,超越国家整合的进程与主权国家的持续重要性有争议地并存着:这种“二元性仍然是全球化中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③。如果捍卫全球化理论的战斗仍旧不能赢得这块阵地的话,警报就始终长鸣着。而且,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近几年不断涌现,它们采取了新的术语,并宣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终结。^④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细节上,这些作品都宣称,围绕着主权、地域国家建立的世界组织正逐渐淹没在新种类的(非地域的)联系之下。这种联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制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权力的空间和机制构成——一种“后国际”^⑤体系,其形式与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国家之间模式的联系越来越少。

在下面的讨论中,在有关这件事的沙堆上将画出两条线。首先,人们争论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存在物,作为当代宣称全球化理论的重要性的关键历史土壤,事实上是个神话。定义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纯粹是基于国家间相互行动的地理基准的,它实际上(在社会学上)来源于最狭窄的国际理论——政治现实主义。而且它已经阻碍了对国际关系更丰富的理解了,这种理解来源于对更广阔的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观念而取得的发展的分析,那是一种看不见的发展,或者无论如何是不相关的发展。准确地说,为什么全球化理论——最具前瞻性的信条——本应该使它自己在知识上更依赖于最传统的历史前提,将在第一章结尾处加以讨论。

如果我们画的第一条线是指向一种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评论,那么令人惊讶的是,第二条线将跨越第一条线以形成同样重要的防线。因为在国际的全球化理论中融合进(正在消退的)威斯特伐利亚信条,将轻而易举地对由跨越人类社会、社会间和社会中的相互行动提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

的那些普遍问题的分析上的决定因素加以直接的否定。这就是说,它已经变为一种否决,即对传统上构成国际关系的显著主题(可以被称为“国际问题”)的否决。这种否决得到了罗布·沃科尔的支持,他以他独特的方式在他的著作《局内与局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⑤中加以赞同。因此,我们将在第二章中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有限的例子,在“国际问题”的关键对应点上构造一个可辩护的版本。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为什么任何人都要关心国际关系学科?而且为什么任何一个不在这个狭隘的领域,并且有可能远离这个领域的读者,都要对这一如此神秘的进程怀有兴趣?答案是:他们有可能并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远离这个学科,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这个学科之外。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化研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接一个学科将触角伸入到“全球范围”内,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于一个地理上扩大的全球视野中。这种延伸使其他学科也进入到国际关系的门槛,因为一种日益形成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的存在,已经非常必然地构成了研究的经验实体。所有这些新来者并不是都能给这个领域带来受欢迎的养分的,特别是在冷战中,这一领域似乎注定知识贫乏。与此同时,以前存在的东西尽管有很多缺点,却是否证明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对新来者们也是意义重大。如果它们不能证明——或者它们证明的东西又证实仅仅只是纯粹的历史现象(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点它们还不能正确地理解,而且这些现象的条件无论如何已经过时了——那么,人们将理所当然地忽略它们。

但是必须说一句友好的提醒的话:新来者应该当心。因为在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积累下来的思考,事实上都是围绕着更为普遍和持久意义这个问题的。那么,对于任何不够谨慎也许会忽视这种可能性的新来者,就应该抱有另一种不

同的预测了。要么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这个学科中重复着历代有关自由主义和其他“理想主义”的实践,他们对现实主义正统的干涉的反对,因其不能掩盖住这些普遍问题的重要性而无所作为;要么他们致力于艰苦的进程,以便以不同的方式重塑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齐格蒙特·鲍曼肯定不是惟一遭遇到后一种命运的人,但是他的例子是惊人的一例:

这个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社会学在处理超越民族国家和其他任何东西范围之外的社会空间上,很是无能为力,除了在分析意义上的被压缩的“环境”。

只有在现在,我们才能理解,在何种程度上,社会学的所有主要范畴因其意义和时间上的无能为力而依赖于典型的社会内空间的关系,这种空间不同于任何由普遍确认(也就是在空间内)的权威认证的想像的社会空间……我认为,苦心经营适合于分析“非社会”的社会空间中的依赖和相互行动的范畴,是社会学面临的最紧迫任务。这种空间是指没有“原则上的同等”、“占主导的文化”、“合法的权威”等等的那一种……需要修正的现实,不仅仅在于它当前的形式,而且也在于它貌似合理的前景,这比社会学家过去试图在知识上理解的任何东西都更具可改变性,更异质,更“不够典范”。^{②7}

鲍曼“现在惟一能……开始理解”的,当然是历代国际关系正统研究中的中心和定义问题。

因此,对于那些正在从外面进入到这一领域中的人而言,全球化的主题可能已经提供了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有用方法,而且他们因此感到疑惑,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如此显著。答案是,一句古老的谚语仍然有用:故事已经告诉你了。

既然如此,全球化理论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遭遇国际关系理论时的困难,而在于它自身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显露出来的深层次的矛盾。在它试图构建一个“全球化”作为解释项时,却导致了“空间”概念的膨胀,这不仅带来了本体论上的判别困难,而且易于制造具体事物而不是解释。并且我们还仍然要说,维持这种优先性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该怎样进行呢?答案只能是,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理论家自身的文本中检查这些假设的结果。全球化理论使它的拥护者如此依赖于有关空间理论的断言,这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是如何寻求证实这些断言的呢?反过来,这些断言是否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他们所经历的解释困难的核心问题呢?我们必须拭目以待。

全球化理论中空间概念膨胀的必然性、其根植于一种可替代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不可能性、具体解释的物化结果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这三个断言中的任何一个,被我们所发现的证据反驳,那么我们批驳全球化理论的全部努力将归于失败。

反之,如果它们都得到证明,则我们就可以作出下列预言。越是不遗余力、系统地追求作为一种解释的全球化理论,其内在的问题就越是具有明显性和断裂性。最后,这种愿望的知识代价证明是如此高昂,以至于必定要出现以下两种结果中的一种:要么,全球化理论的断言将不言而喻地从其自身争论的进程中撤退(在经过一系列维护行动趋于失败后),这就是我们试图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需要指出的细节;要么,那些断言将从一开始起就成为如此强烈的知识上模棱两可的东西,以至于作者必将防止他们自己(也许是明智地)自由发挥。然而,后一种策略的结果(在让·阿尔特·肖尔特的例子中就显出来了)就是,不可能出现清楚的、明确的论点。由于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断言必然以某种摇摇欲坠的形式出现,这种知识上的模棱两可与建筑上的荒谬极为相似。

如果全球化理论必然具有混淆视听的性质,我们又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将其作为学术评论的主题呢?为什么不简单地等着它自行倒塌呢?答案是双方面的。首先,我们的怀疑和预测在这一阶段仅仅是怀疑和预测,它们还没有得到证实。其次,全球化理论的当前流行式样并非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如果认真对待的话,它所作的断言混合着一种理论对另一种的否决,这将成为理解普遍意义上的当代世界和特殊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的有利资源。在我们进入下一章之前,我们将停下来看一看这种否决包含着什么。

它似乎有三个主要要素。其一,在全球化理论代表着决定性地超越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古典作家想像范围的当代世界时,这一理论在事实上又抛弃了确切理解极为重要的时空理论的关键资源。一旦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丰富的解释范畴中脱离出来,这些现象自身就转换成一种不能复归的原由——就会出现把这些古典作家早已问题化、非神秘化的东西重新自然化的现象。这一进程的一个中心特征对于空间范畴的系统崇拜,这是潜伏在“全球化”中的可能性,但是空间又只是在它被用来在社会解释结构中扮演角色时才有活力。这又反过来带来社会科学解释性断言缩小的悖论。对于现代性的最深层次的经典质疑——最戏剧性、最反直觉的发现都是由此发现的——现在正被重新封锁起来,这归因于那些业已过时的社会解释的具体化,它们在新的科技语言的帮助下获得了进步性的再生。

其次,由于把普遍的社会关系和这些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合并在一起,即漫画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化理论错误地理解了国际关系这种行将过时的形式的进一步演进。在这方面,现存国际关系理论远没有取得进展,它只是简单地放弃了这一领域,而且不幸地再次制造了自由理想主义的许多谬误,因

而在某些特殊的分野上加入了现实正统主义长时间维持的阵营。当其出现之时,“现实主义者”的反应将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理论的毁坏因素,正如它们在反击传统动向的地缘政治学时所做的那样,使后者的领域难以构成理论。

最后,作为社会学思潮和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今的会聚点,全球化理论成为这一领域中最大的迫切需要之物——一种真正的国际体系的社会理论——的最近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具断裂性的障碍。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不再是只事关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事物(如果它曾经是),尽管它起源于社会学,关注国际进程,但全球化理论既不偏袒前者,又不维护后者。

就其自身而言,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与作为“社会理论中心主题”的方法背道而驰的。但是,考虑到这一论题在公众讨论中所承担的模棱两可的角色,我们就必须对其进行更积极、更富有批判性的诊断。这就是本书试图提供的内容。

注释

- ① 摇安托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载《现代性批判》),剑桥,1990年版,第100页。
- ② 摇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逃逸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见《逃逸的世界》),伦敦,1990年版。
- ③ 摇1990年10月10日。
- ④ 摇酝·奥尔布罗:《全球化时代》(载《全球化时代》),剑桥,1990年版,第100页。
- ⑤ 摇酝·费瑟斯通、杂·拉希:“全球化、现代化和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化概述”(见《全球化时代》),载酝·费瑟斯通、杂·拉希和砸·罗伯逊编:《全球现代性》(见《全球化时代》),伦敦,1990年版,第100页。

- ⑥ 播在· 鲍曼 :《全球化 : 人类的结果》(《纽约时报》, 伦敦 1998 年版, 第 5 页)。
- ⑦ 播同上, 第 5 页和 5 页。
- ⑧ 播同注释 5 第 5 页。
- ⑨ 播沃特斯 :《全球化》(《纽约时报》, 伦敦 1998 年版, 第 5 页)。
- ⑩ 播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第 1 页。
- ⑪ 播比如, 可参见他在《1991-1992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纽约时报》, 伦敦 1992 年版) 的“导言”中对“劳动”范畴的讨论, 厄· 尼古拉斯翻译, 哈蒙沃斯 1992 年版, 第 5 页。
- ⑫ 播粤· 胡格维尔特 :《全球化和后殖民世界 : 发展的新政治经济》(《纽约时报》, 伦敦 1998 年版, 第 5 页)。这一断言是在对吉登斯的作品特别是《现代性的后果》的简短讨论的结尾处出现的。
- ⑬ 播刘易斯· 芒福德关于“没有两种文化是生活在相同种类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的观察, 在 1991 年动笔时就毫无争议 [参见他的《技术与文化》(《纽约时报》, 伦敦 1991 年版, 第 5 页)]。自此之后, 该观点又不断为人类学和其他研究的成果所充实。其中一些著名的有 耘· 埃文斯· 普里查德的“鲁尔的时间计算”(《纽约时报》, 1991 年, 《非洲》1991 年第 5 期), 保罗· 博安南的“尼日利亚提夫族的时间概念”(《纽约时报》, 1991 年, 第 5 卷, 第 5 页- 5 页), 皮埃尔· 鲍迪埃的“阿尔及利亚农民对时间的态度”[《纽约时报》, 1991 年, 第 5 卷, 第 5 页- 5 页], 载《人类学的西南杂志》, 1991 年第 5 卷, 第 5 页- 5 页], 皮特· 弗里斯 :《地中海的乡人 : 有关地中海的社会人类学论文》(《纽约时报》, 巴黎 1991 年版), 马克· 布洛赫的“现在的过去和现在”(《纽约时报》, 1991 年, 第 5 卷, 第 5 页- 5 页), 克里福德· 格尔茨的“巴厘的人、时间和行为”[《纽约时报》, 1991 年, 第 5 卷, 第 5 页- 5 页], 再版于他的《文化的解释》(《纽约时报》, 伦敦 1991 年版, 第 5 页)。